

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

封永平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既有的霸权国同后起的新兴大国间,以争夺权力为特征的霸权战争不可避免。^①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甚至将“和平转换问题”认定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难题。^② 然而,我们对这样的理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③ 在近现代史上,英美之间权力的和平转换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出现对大英帝国在美洲的利益和皇家海军在大西洋的霸主地位构成了严峻威胁,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可能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美英两个国家,一个是正在崛

• 非常感谢两位匿名评阅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多次修改意见,他们的宝贵意见使本文得以不断完善。

① 有关霸权转换理论,请参见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MacMillan, 1987);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② 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pp. 208—223.

③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总第3期),第21—43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起的挑战者,另一个是日落西山的霸主,这正是两国可能走向冲突的一个动因。然而,我们似乎在史书上并没有读到关于这场英美大战的描述^①,英美之间并没有按现实主义的逻辑走向霸权战争,相反却大体上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双方不但解决了诸多可能引发冲突的分歧和争端,而且培育出了一种持续至今的战略盟友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阻止了双方霸权战争的爆发并使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换?现实主义的霸权转移理论对此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认为,由英美互动引起的认同变迁是实现双方权力和平转换的主要变量。

一、为什么可以用建构主义来 解读英美权力和平转移

虽然美国从建国伊始就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无意于取得世界霸权,但它日益增长的强大势力却最终使它兵不血刃地取代了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硝烟、衰败不堪的英国。为什么它们之间的霸权转换没有引发战争呢?

我们来看看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对国际关系历史中存在的这一明显例外所做出的解释。对此问题常见的解释是威胁均衡论(balance of threat),该解释与英国对19世纪末的国际环境中的威胁认知有关。它认为,19世纪末英国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多重的威胁,不仅美国在迅猛崛起,而且德国、日本等国也在欧洲和东亚崛起,都对英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在战略挑战面前,英国选中了美国而不是德国与之和解,是因为威胁的邻近性影响了英国对威胁的认知,英国在决定制衡威胁的时候,仅仅挑选了一个地理上距离最近的挑战者。尽管此时美国远比德国强大,但由于德国离英国很近,在英国人眼中,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更大,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这是导致英美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原因。^②然而,均衡威胁的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要竭力培育与

^①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94页。

^②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68; R. G. Neale, *Great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Expansion: 1898—1900*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97页。

美国更为友好的关系,甚至帮助它增强其权力?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这样的行为是极端危险的,因为今天的盟友可能变成明天的敌人。从深层次看,英国把德国而不是美国看作自己的威胁,恐怕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原因。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克(Stephen Rock)就注意到,英国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出于地理上的考虑,更多的是建立在对美国行动意图的充分理解上,英国也并不期待美国有同样的支持回报。^①另外,这种威胁均衡论的观点更难以解释美国方面不断增加的对英善意友好的行为和观念,因为美国既无必要也不寻求英国任何正式的联盟保护。因此,英美间发生的这一现象一定有着其他更为深刻的原因。

第二种解释是现实主义者所长期偏爱的均势论(balance of power)。他们声称,只有权力平衡才会产生稳定的和平局面。从这个理解出发,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伯恩(Kenneth Bourne)、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人认为,正是由于当时英美之间存在的均势导致了两国之间和平局面的出现。^②1896年两国并没有在一触即发的委内瑞拉冲突中走向战争,是因为英国考虑到与美相比对己相对不利的军力分布。^③而实际上,委内瑞拉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实力被放大了,仅仅有三艘一流战舰的美国还谈不上拥有什么真正的海军,而它面对的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④如果说美国实力不足的话,在这次和其他危机中,美国既没有依循均势政策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联合,也没有得到其他大国的有力支持。相反,如果美英战争爆发的话,美国甚至还会将他国比如德国也视为对手,因为德国一直对拉美抱有打算。^⑤因此,均势论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

① Stephen R. Rock, *Why Peace Breaks Out: 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pp. 35—37.

② Kenneth Bourn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340—341;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p. 107—109; Arthur J.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 1880—1905* (New York: Knopf, 1940), pp. 254—257.

③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④ A. E. Campbell,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03* (London: Longman, 1960), p. 124.

⑤ A. E. Campbell,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03*, pp. 31—33.

第三种解释是维持现状论(status quo)。美国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其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中承认,权力转移造成领导国地位变化但没引发战争的惟一例子是在英美之间。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容忍美国取代其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是因为美国实现权力转移时采取了和平方式,美国遵守了英国的国际秩序以及英国的衰落所致。美国的崛起使美英双方获利。^①简而言之,原因在于美国是主张维持现状国家,没有挑战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按照奥根斯基的划分标准,美国是属于“强大且对现存国际秩序满意”的国家。事实上,很难有后来崛起的新兴大国满足于霸权国既定的霸权体系,大国的崛起必定会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变革性影响,导致国家间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后,就将美洲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频频打出门罗主义的旗号,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赶出了美洲。大英帝国在美洲的利益除加拿大得以保留外,几乎丧失殆尽。奥根斯基只是看到了美国崛起时应对霸权国英国所采取的和平方式,但却没有指出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背后的真正原因。

对英美之间权力的和平更迭,除上述现实主义的几点主张外,自由主义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把其原因归结为英美两个讲英语国家的民主性质,也就是西方一度盛行的“民主和平论”的观点。^②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提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康德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命题,即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彼此发动战争。自然,同属民主国家的英美之间也不会打仗,这就成为了英美之间出现权力和平转换的原因。然而,这一命题尚难以通过迄今为止所做的历史个案的统计学检验。在统计学上,民主国家似乎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常介入战争。^③仅以本文英美个案来说,19世纪末美国崛起时没有与英国发生战争是一个事实,但该理论没有充分说明,两国间究竟是如何培育出共属自由民主伙伴的相互认知,从而促使两国权力的和平转移。比如,它就难以回答,

^①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p. 363—377.

^② 参见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Summer 1983), pp. 205—235;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 4, December 1986, pp. 1151—1169;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8—40.

^③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72页。

为什么同样是这两个自由民主国家会在 1812 年爆发战争。

总之,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上述种种观点都不足以充分解释英美之间的权力和平转换,这促使我们去寻找其他的原因。

冷战前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迅速兴起的建构主义给我们研究权力和平转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建构主义,又称社会建构主义,是从社会互动与认同相互建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它是考量国际体系中观念配置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①它弥补了只关注权力话语和制度话语等理性主义理论的缺陷,观念、认同、文化因素的注入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学者在提及建构主义思想内涵时,所指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综合各家之言,以及考虑到本文诠释有关问题之所用,一种切实有效的建构主义研究至少大体上指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认同政治的理论。它从认同入手来考虑国家行为选择。认同^②是建构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它来自社会心理学,指“一种自我(认知)框架,通过现实的和想像的人们对自我内涵共同认识而形成和保持”^③,或是“一种自我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感觉”^④。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直觉,另一个是对他人承认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事实的直觉”^⑤。这表明“依附于一定心理状态的认同总是存在于一个具体社会建构的世界里”^⑥。也就是说,认同本身也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它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

① 一些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家,对建构主义是否是理论表示怀疑。如肯尼思·沃尔兹从它难以证伪的角度出发断定它不是真正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一切对国际政治社会内容的考虑和对国际政治诠释性的研究都被视为没有明确研究议程和可证伪假设的非科学解释。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19 页。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58—179.

② 本文在动词和名词两种意义上使用认同。

③ B. R. Schlenker and M. F. Weigold, *Goals and the Self-identification Process; Constructing Desired Identity*, in *Goal Concept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Hillsdale, Erlbaum, 1989), p. 245.

④ E.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 p. 17.

⑤ Ibid., p. 50.

⑥ Peter Berger, “Identity as a Problem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 No. 1, 1996, p. 111, inferred from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7—398.

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① 由此出发,国际政治层面的认同的形成就可以简化为两个前提:国家特征与形象自我设定与他国(国际社会)承认。认同有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集体认同之分。实体认同和类型认同基本不需他者承认即可获得,是国内政治层面的整合产物。角色认同和集体认同则完全是国际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国家间互动和观念判断的结果。本文主要在包含角色认同在内的集体认同意义上谈论认同。

第二,从主体间实践活动而言,建构主义是国家互动的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参与互动并非如理性主义那样先验给定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认同和利益内生于国家间的互动进程中。国家互动的结果建构了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的形成反过来又对行为体的行为(互动)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认同和利益不仅仅是在互动中习得而来,而且也是由互动所支撑的。

第三,从国际体系角度出发,建构主义是文化(结构)理论。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主要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分配或称为国际体系文化,它的构成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国家物质性实力因素只有文化(共有观念)赋予其意义才能产生有作用的行为。

根据国家间互动性质的不同,国际无政府体系存在三种不同的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由于共有观念或文化本身就是集体认同的属性和特征,文化结构主要指一种认同结构,因而,本文将三种文化根据不同的互动简约为三种认同:敌人认同、对手认同、朋友认同,并将它们分别假定为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三种互动模式的主要构成基础。从本质上说,敌人认同和对手认同是一种几乎完全从自我考量出发的自私认同;朋友认同则是包含他者认同及利益在内的利他认同。从安全方面看,敌人认同在安全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认同;对手认同在相互生存上达成认同,这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认同;朋友认同则是一种在安全上达到了较高程度的集体认同。因此,在敌人认同中,国家行动的逻辑是霍布斯式互动模式:相互敌视、相互残杀、侵占和吞并对方。对手认同下,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洛克式互动模式:相互承认生存权利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4.

(主权)、寻求安全、维持现状、有限度使用暴力。朋友认同驱动下国家行为的逻辑是康德式互动模式:非暴力和互助。

由于认同是由观念构成的,国家既可以建构敌人认同、对手认同,也可以建构朋友认同。如果国家互动的实践活动发生了变化,观念发生了变化,认同也就会发生变化。温特为此专门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进化性的认同转换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他将一切类型的多次的社会互动简化为一次两人互动,并将一次的社会互动过程分解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我根据对情境的预定义开始采取某种行动。这就向他者发出了信号,告诉他者自我在互动中要扮演的角色和自我要设定的他者的相应角色。实际上,自我试图把自己对情境的定义“教授”给他者。第二阶段:他者思考自我采取的行动的意义。第三阶段:他者根据自己对情境的新的定义,开始采取行动。向自我发出信号,告诉对方他者要扮演的角色和他者要设定的自我的相应角色。第四阶段:自我解读他者行为,准备做出回应。这四个阶段构成了社会互动最简单的全套过程,互动的结果是,经过复杂的社会学习,双方都放弃了自己原有较为过分或不切实际的认同观念,习得了一种共有观念,并势必在以后的互动中再现这些观念,从而塑造了双方新的认同和利益,造就了认同的转换。^① 权力关系在决定这一认同转换的发展方向方面起着一定的干预作用。如果一方掌握着较大的权力,就可以促使另一方认真考虑并积极响应对方发出的信号,改变自己原先的观念和做法,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在权力的作用下,社会互动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的一方发展。

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英美权力转换的实践中。其一,英美两国近代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战争敌对状态到正常竞争状态再到友好关系的转变过程,这与两国从霍布斯式互动到洛克式互动,再到康德式互动的实践完全一致。其二,英美从霍布斯式互动到洛克式互动,再到康德式互动的变化,正好吻合了两国从敌人认同到对手认同再到朋友认同的转变。其三,英美从敌人认同到对手认同再到朋友认同的转变,与美国崛起、英美两国权力转移的过程相一致。这种转变和一致并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国家行为体有意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29—331.

识地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这说明英美两国的认同变迁,尤其是最终朋友认同的建构在英美权力和平转换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英美霍布斯式互动模式和敌人认同

1814年英美《根特和约》签订前,英美两国间处于敌人认同。这种认同的特点,一是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二是不愿限制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为此,英美国关系表现为敌对关系,互将对方建构并再现为敌人,相互敌视,双方霍布斯式互动的结果是两次战争的发生。^①

第一次英美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尽管美利坚殖民地对英国议会通过的5个“不可容忍的法令”不满,但殖民地开始并未谋求脱离英国。第一届大陆会议仅仅做出了抵制英货的决定,“经济抵制是美国外交最初年代常常使用的手段”^②。这本来是正常的反应符号却被英国放大,并开始将对方建构为敌人。英王乔治三世声称:“必须用战斗来解决它们是隶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③即使这样,第二届大陆会议仍未宣布独立,杰斐逊在《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的公告》中,明确表示“并不怀有野心,想要同大不列颠分离和建立独立的国家”^④。约翰·迪金森代表大陆会议起草致英王的《橄榄枝请愿书》,急切希望恢复大不列颠与殖民地之间旧有的和谐,企求英王在达成“愉快而持久的和解”之前不采取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如果就此不接受英国赋予的敌人角色,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美国可能也不会产生。然而,英国进一步的敌意行动反过来恶化了双方的认同。乔治三世不但拒绝接受请愿书,而且宣布殖民地处于公开的叛乱状态,派遣英军前去镇压并断绝与殖民地的贸易,没收殖民地的船只与货物。殖民地则宣布正式独立,彻底断绝与英国的一切政治联系。至此,双方恶性的霍布斯式互动使敌人认同最终得以形成,由经济层面的矛

① 本文采用建构认同话语来诠释战争并不涉及是非问题,只是将战争放至认同语境中加以客观解读。

②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1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页。

③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215页。

④ 何顺果:《美国史通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盾迅速上升至政治层面,敌意逻辑被权力政治激化的结果就是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英美战争,又称为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①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为新生美国打造的第一个外交指导原则是孤立主义,本意是为了疏远在第一次英美战争中颇为密切的法美关系,竭力避免与强大的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发生对抗。为此,在1793年英法开战后,美国不惜违背与法国曾经签订的同盟条约,背叛昔日盟友,宣称保持中立立场,“对交战国各方采取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并请求法国政府将在美煽动对英开战的法国公使热内召回。美国还在《杰伊条约》中对英方做出巨大让步,允许英国舰船自由出入美国港口。应该说,美国对英国发出了一系列友好的暗示信号。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获得英国积极的回应。相反,美国的中立却遭到英国的威胁,英国皇家海军执行封锁政策不断袭击与交战国法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船,甚至强征美国海员。特别是美国的战舰“切萨皮克”号还遭到了英国军舰的炮击和强行搜查。但杰斐逊政府仍然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接受英方试图传递给它的敌对身份认同,没有动用武力回应而采取了无奈的对自身带来巨大损失的贸易禁运措施,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虽然随后又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但英国依然不予认同,继续劫掠美国商船。英国的蛮横态度使美国迅速接受并再现了对方的敌人形象,美国认为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办法全然无效,除了开战已别无选择。杰斐逊说:“时间、耐性和爱好和平的一切希望都已竭尽,我们所剩下的惟一抉择就只是战争或者可耻的屈服了。”^②18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首先对英国宣战。如果此时英国反过来对这一敌人认同不予接受而向良性互动,那该认同就有可能弱化乃至消失,战争有可能避免。事实上,英国6月16日做出了友好姿态撤销了先前对美实施的各项禁令。当时如果能有一条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报线,此举也还不算为时过晚。^③但不幸的是,由于通讯工具落后,反应迟缓,美国国会毫未闻及这一让步之举,等得知消息时已是对英宣战5天以后。因而延误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的机会,使得双方恶性的霍布斯式的互动最终未能幸免。

^①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②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467页。

^③ 同上书,第466页。

三、洛克式互动模式与对手认同

英美《巴黎和约》及《根特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间一种制度化的关系初步形成。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作为主权实体的存在地位,放弃了占领美国的企图,美国则放弃了侵犯加拿大的意图。最低限度安全认同的达成,说明两国已开始从敌人认同初步转变为对手认同。对手认同的特征是相互竞争,维持现状。两国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征服他国和侵占他国领土已经不是主要目的,但国家间仍未放弃战争威胁的暴力方式解决双方争端,战争威胁的话语在国家间仍不时出现。特别是美加边界领土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英美两国仍存在着众多潜在的利益冲突点,这些争议和分歧是否会再次引发战争使两国间的认同复又回到敌人认同呢?

战后美国各届政府都把发展同英国的关系放在外交的优先地位,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美加的边界领土划分问题,培育双边安全互信。为此,美方推出的第一个缓和双边关系的举措是建议双方在大湖区裁军。美方的善意表示得到英国的接纳。《拉什—巴戈特条约》(Rush-Bagot Treaty)规定英美两国在安大略湖和尚普兰湖各自只保留一艘军舰,在其他湖上只保留两艘,用于缉私。^①如此军事力量的配置使两国在大湖区的防守形同虚设,表明双边的互信度开始提高。但《拉什—巴戈特条约》并没有最后解决美加边界问题,它所遗留下来的潜在领土争端很快凸显出来,使刚刚培育起来的对手认同和初步互信面临严峻考验。

首先是“卡罗琳号”事件(The Caroline Affair)。加拿大发生反英起义后,边界局势开始动荡。加拿大人越过争议边界烧毁为加拿大起义者运送物资的美船“卡罗琳号”并杀死了一名美国人,美国随后逮捕了加拿大人亚历山大·麦克劳德。英国人为此大为不满要求立即释放麦克劳德,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威胁说:“(否则)将会引起战争,而且是性质可怕的战争,因为它将是一场施行报复和惩罚的战争。”^②但这种战争的信号很快由于美方的克制而得到抑制,美

^① 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②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682页。

国国务卿韦伯斯特决定和平解决分歧,避免激发英美军事冲突,最后释放了麦克劳德。

其次,几乎在发生“卡罗琳号”事件的同时,缅因边界争端问题又凸显出来。美英东段有争议的边界地区为12万平方英里^①,加拿大拘捕了进入争议地区的美国缅因州的土地局“越界”官员,从而又引发了边界争端。双方都在边界增加军事力量,东北边境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美国并不愿耗费巨大财力真正同强者英国展开一场大规模战争。英国也无意扩大事态使刚刚建立起的双边关系发生恶化。由于双方的克制,霍布斯式互动并未形成,双方最终选择了谈判方式,《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the Webster-Ashburton Treaty, 1842)确定了这一地区的边界划分。于是,英美争端便成为一场未宣布的不流血“战争”。

第三是俄勒冈问题。根据1818年英美协议,俄勒冈由英美两国共同占领,两国长期未划定边界线,度过了20余年的平静时光。由于美国的移民日渐增多,他们便要求将北至阿拉斯加边界(北纬54度30分)的整个西北部并入美国。美国首先发出了威胁的口号:54度30分,否则就是战争。战争的乌云笼罩在俄勒冈上空。但英国并没有接受美国试图赋予它的敌人角色,考虑到英国在俄勒冈的控制现状和实际价值,英国不愿为遥远的俄勒冈而与美国开战,英国表示接受按北纬49度为边界线的主张。而美国则竭力避免同强大的英国再次发生冲突而在俄勒冈问题上对英妥协。于是,双方最终通过谈判达成了边界条约。

此外,美国内战也是引发英美冲突的潜在区域。英国在内战中倾向于南方,但林肯政府对英采取退让政策,及时释放了导致两国危机的“特伦特号”事件(The Trent Affair)中两名南部同盟的使节,使英国失去了对美宣战的借口,新的英美战争并未形成。但由于内战中英国建造的“亚拉巴马”号铁甲舰(The Alabama Raids)交南部同盟使用后,给北方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美国战后为此向英国提出了赔偿要求,甚至向英国暗示只有割让加拿大才能弥补美国的巨大损失。从而使两国关系“自1812年战争以来,从未恶化到内战结束后的危险地步”^②。

^①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② 罗伯特·莫厄特:《英美外交关系》,伦敦,1925年,第206页。转引自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第172页。

但美国认为并不值得因为加拿大与强大的英国发生冲突,格兰特总统坚定地支持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①,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常常痛苦地澄清他无意从英国手中抢夺加拿大,这两个北美国家的任何联合都应是“自由和自发的”并经过“与大不列颠政府最充分的协商”^②。美国的克制得到了英国的让步,双方一致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经过了漫长的两个月 37 次双边谈判后,英国在缔结的《华盛顿条约》中就“亚拉巴马号”问题向美国道歉,并在随后的日内瓦会议上就造成的损失对美做出赔偿。此外美国还从英国手里得到了圣胡安岛,彻底解决了双方最后的领土争端。

至此,美英确定了自大西洋至太平洋的整个边界,解决了美英关系中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互动的实际结果:边界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对美英双边关系而言意义深远。双方不仅维持了两国间的正常关系,巩固了两国的对手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通过相互克制、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而没有诉诸武力,这表明两国正在形成新的重要的认同和利益的增长点。这种增长的认同成分就是安全互信度的提高,美加边界不再设防,这为两国间朋友认同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康德式互动模式和朋友认同

美国内战后,美英开始进入朋友认同的形成期,原来的对手认同日益转变为朋友认同。朋友认同的特征是非暴力和互助。朋友间不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暴力方式解决彼此间问题,并在朋友需要时鼎力相助。朋友认同下国家间关系表现为康德式的友好互动,这种实践的进程反过来又会强化彼此朋友认同的观念。

美英这种认同的深刻转变首先是从双方各自的认同观念的转变开始的,并通过一系列的双方互动行为逐渐建构起来。

19 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自身实力的认同定位发生了变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 1003 页。

^②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3.

化。虽然美国在19世纪初(1823年)就提出了反对欧洲国家干预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将自己标榜为美洲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实际上它自身的真正定位仍是在北美发挥作用,在大陆一隅进行领土扩张和整合。门罗主义所起的作用至多只是虚晃一枪,欧洲列强也根本没将它放在眼里,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少影响。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世纪末,美国开始频频援引门罗主义,它无疑已将自己认同为整个美洲的主人,但这必然会与英国长久以来在美洲的地位和利益发生冲突,这也是美国在成功解决其本土与大英帝国利益冲突后首次在海外与英国再次遭遇,这一次双方怎么解决分歧,是互不相让采取战争手段还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就成为英美两国政策决策者所要面临的首要抉择。

委内瑞拉危机首先进入两国的冲突视野。委内瑞拉危机起因于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间的边界领土争端。英国人最初从荷兰人手里得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双方的边界划分就不甚明确,英国人按照自己定义的“绍姆堡线”(Schomburgk Line)进行殖民开拓,遭到委内瑞拉的反对。19世纪90年代双方争端日趋尖锐。委内瑞拉曾向美国多次求助,美国在自身认同定位发生转变后,决定介入。美国国务卿奥尔尼照会英国,声称门罗主义要求美国干预这一危机。英国则以门罗主义不是国际法为由对美方这一表态予以拒绝。这一恶性互动使双方冲突迅速升级,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在向国会所作的咨文中声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办法”来抵抗英国。如果英国针锋相对采取反措施使互动得以形成的话,则双方间一场大战将难以避免。经过谨慎的考虑,面对着不断崛起的美国,已与美国建构起诸多认同基础的英国,决定将两国间的对手认同提升至朋友认同,准备接纳美国的新的认同定位,以构筑英美联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将英美亲善列为英国外交一大目标^①,同意接受美国仲裁。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 Chamberlain)说:“我们不贪图美洲的一英寸领土。两国之间发生战争不仅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且是一种罪过。……两个国家是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在情感上和利益上比地面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②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Robert Salisbury)也公开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他把英美可能发生

^①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第202页。

^②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p. 418. 转引自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第198页。

的战争称作“兄弟之间的相互仇杀”，希望今后“米字旗与星条旗能够一起飘扬”^①。美国自然对英国赋予的朋友角色欣然接受，并开始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利益。作为退让，美国通过仲裁最终以牺牲委内瑞拉为代价将争执领土的大部分交给了英国。至此英美间朋友认同初步形成。

第二个反映英美认同变化特别是英方认同观念变化的例子是巴拿马运河问题。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最大的战列舰“俄勒冈号”从旧金山开往古巴的圣地亚哥，必须绕道麦哲伦海峡，开足马力行驶 65 天完成长达 13 000 海里的航程，才能有效地参战。^② 这一事件触动了美国的想像力，沟通两洋运河的念头变得愈加迫切。然而，1850 年同英国签订的规定由两国实行共建共管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阻碍着美国这一雄心的实现。为排除这一障碍，英美开始修约谈判，英国基于朋友认同出发，在谈判中对美国做出了巨大让步，当第一份协议《海—庞斯福特条约》被美国参议院视为过于亲英没有充分照顾到美国利益而予以否决后，英国又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重新签署了第二份条约，新条约几乎完全推翻了原有条约的所有条款，赋予美国单独修建、修筑防御工事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权利。这充分反映了英国竭力构建双方朋友认同的价值取向。此时，美国同英国建立友善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③

与巴拿马运河问题相联系的还有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争议的地区仅是阿拉斯加海岸约 30 英里宽的一个狭长区域，引起争议的原因是这里发现了金子。加拿大要求英国代表加拿大就此同美国谈判，英国再次对美国做出了让步，不顾加拿大的愤怒而将大部分土地仲裁给了美国。英国驻美大使庞斯福特 (Julian Pauncefote) 为此曾说过：“美国似乎是我们现在仅有的朋友，与之相争将是很糟糕的。”^④ 这表明英国已完全认同了美国这一新的朋友身份。

作为互动一方的美国也竭力在一些次敏感的问题上对英国形成友好呼应，避免与英国发生对抗。第一件事是尼加拉瓜危机。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取代英

① Charles S. Champbell,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00* (New York, 1968), p. 213. 转引自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第 198 页。

②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9 页。

③ 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宋岳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42 页。

④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 165.

国在尼加拉瓜统治的努力。由于尼加拉瓜驱逐了英国驻尼的总督而引发了危机,英国向尼加拉瓜发出最后通牒并派出了战舰。尼加拉瓜向美国求援,美国则拒绝引用门罗主义,反而告诉尼加拉瓜应当满足伦敦的要求。另一件事是危地马拉债务问题。英国拥有危地马拉的大部分债权,当危地马拉政府准备拒绝清偿这些债务时,英国马上对危地马拉施加了威胁。美国曾试图向英方建议由美国来接管这些债务但认识到英国反对后,美国并没有采取对抗措施。相反,对该事件开始置之不理。

从上述英美认同转变所引发的互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英美在涉及双方利益的冲突中彼此让步而使得两国间的朋友认同得以逐步建构起来。英美间形成的朋友认同突出表现在两国相互间放弃了针对对方的战争计划。长久以来,英国海军的发展计划一直坚持着所谓“两强”标准,这意味着岛国的海军力量至少要不低于仅次于它的最大的两个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1901年,英国海军大臣塞伯纳(Selborne)勋爵调整了海军标准,明确将美国排除在外。在1905年英国与日本缔结联盟的续约谈判中,两国一致同意它们联合起来的军事力量应该与任何两个潜在的对手相匹配。但英国始终坚持美国不应在所计算的两个对手之中。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Landsdowne)对此所作的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考虑与美国发生战争的丝毫可能性”^①。

英国放弃对美国战争计划还表现在英国从西半球大规模撤出军队的时候。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开始从美洲撤军,限制了自己在美洲的政治利益。^②1904年,英国决定从哈利法克斯、巴巴多斯岛、特立尼达岛、百慕大群岛、牙买加等地撤出所驻扎的步兵团。1906年,最后一支英国正规军离开了加拿大土地。^③

美国则根本没有对英国的战争考虑,这表现在其微弱的军事力量上。美国长久以来对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不感兴趣。如果不是在战时,它几乎没有保持常备军,只依靠民兵来维持日常防御。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的正规军立即得

①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p. 230.

②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 166.

③ Kenneth Bourn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ates, 1967), p. 389.

到裁撤,从1865年的103万锐减至1866年的1万人。^①这反映了美国对当时形势的安全认知,并没有将当时的霸权国英国视为自己的真正威胁。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曾经对一名英国外交官说:“你永远不会被两大英语民族之间可能争斗的梦魇所惊扰,就是在继续为可能的战争作准备的时候,我也从未考虑过同英国发生战争,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②

英美朋友认同的形成,反过来又推动了双方康德式的互动进程。双方不仅在涉及两国争端中相互让步,而且还在一些重大行动中相互支持,进行战略合作。

美西战争爆发后,英国本应持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中立立场,相反,英国却为了借此机会显示两国的友好而对美国向西班牙宣战表示欢迎。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发表英美亲善演说,并要求缔结英美同盟,说只要“星条旗和英国国旗在盎格鲁—萨克逊联盟上空一起飘扬,就可以用低廉的代价赢得战争”^③。英国还通过多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给予支持。英国将原本巴西订购的两艘巡洋舰迅速转给美国,以增强美国相对弱小的海军力量。英国还怂恿埃及拒绝给予一支西班牙分舰队补充燃料以阻止它们前往远东去攻击美军。甚至英国还允许美国军舰停靠使用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在吞并非律宾问题上,英国更是如影随形,积极支持美国扩张力量,不但公开拒绝西班牙提出的列强共占菲律宾的要求,而且声言除了西班牙之外只能是美国而非他国能够拥有菲律宾。英国除借给美国海军登陆艇使得美军得以顺利占领菲律宾班乃岛外,英国还使用炮艇直接介入战斗帮助美军控制菲律宾中部战略重镇宿雾市。^④

同样,美国也对英国发动的布尔战争给予了支持。当冲突爆发后,西奥多·罗斯福立即向英国表达了支持的立场,声称:“这场战争完全符合两大英语民族的利益因而也就符合文明世界的利益,英语应该成为南部赞比西河的语言。”^⑤在战争期间,美国向英国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担负了约占英国战争开

①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2.

②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pp. 106—107.

③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④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pp. 33—50.

⑤ *Ibid.*, p. 93.

支 20% 的贷款。总之,与大多数的国家甚至盟国间的关系不同,英美两国在国际上相互支持增加或捍卫了各自的权力地位,使英美之间朋友认同的基础更为牢固。此后,随着英美在两国集体认同的基础上不断互动加以巩固与强化,两国间不但没有再发生战争,反而进一步凝结成一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英美特殊关系”。

五、英美认同变迁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英美两国认同是怎样通过具体的无数次的国家互动的实践得以再造和转化的,它完全符合建构主义所言的认同转换模式机理。

1814 年之前,占据霸权地位的英国直接以武力手段向美国传递了敌对的强制解决信号,美国接受了对方赋予的角色,通过两次战争两国间形成了敌人认同的国际关系结构。此后,美国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出发,希望改善与英国的敌对状态。美国在一系列边界争端中做出妥协姿态,避免与英国发生对抗,英国则接受了对方希冀赋予的“对手”角色,并不断修正自己原有的不切实际的占领美国的盘算,两国间形成了一种对手认同下的正常国家竞争关系。19 世纪末,英国在委内瑞拉危机、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对美做出大幅度让步,希望美国能以朋友相待,正在崛起的美国则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角色,双方在一系列国际事件中相互支持,呈现出战略伙伴关系的特点,构建了新型的认同结构——朋友认同。

总之,英美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形成并不是浑然天成的,而完全是英美两国经过长期的外交实践与良性互动、长期的认同磨合与转换构建而成的。那么在英美间存在的这种成功的认同转换模式中有哪些因素或变量促成了两国集体认同的形成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即安全合作、文化同质性和战略克制在导致英美认同转换的互动进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集体认同的生成在三种形式互动中都普遍存在,为研究之便,本文只涉及从对手认同向朋友认同的转换。

(一) 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包含着重要的互动内容。对于崛起大国与霸权国而言,双边之间

进行最为敏感的安全领域的合作互动对于缓解乃至破解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双方的安全互信与认同感的形成,产生迅速的“扩展”或“外溢”效应,全面改善和提升两国关系。美英之间在北美共同面临着漫长的包含诸多争议的边界,使得双方不可避免地在北美大陆处于敏感度极高的安全依存状态,在这种被多伊奇(Karl Deutsch)称为“核心地带”的地方,随着安全合作所致的互动密度的增加,认同的同心圆必然就会出现。

英美的安全合作首先是从美加边界实现非军事化开始的。英美在1812年兵戎相见,相互交恶。此后,安全困境驱使着双方军事力量在美加除大湖区之外的边界上处于对峙状态,两国都在边界上大修堡垒以加强边界防御能力。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先后在魁北克、哈利法克斯、安大略等其他接壤地带修建了代价高昂的据点。英国为此还专门沟通运河以让战舰得以通过尼亚加拉瀑布进入大湖区上游。美国从1816—1829年用在边界上的防卫开支达到825万美元之多。^①这说明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还处于互不信任状态。此后,双方从大湖区裁军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边界安全谈判及其协议,奠定了两国互信的基础。1871年的《华盛顿条约》解决了双方历史遗留的所有领土分歧,双方形成的安全共识用制度化的框架形式固定下来。在这种框架下,两国军事行动的透明度和信任度逐步提高,使彼此间产生了一种互不使用武力的安全的预期,这也使得两国比先前更能妥协地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分歧。^②为此,英国在1871年在边界领域开始裁军,停止了美加边界的日常防守计划。而长期厌恶保留军队的美国更不愿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武装北部边境,将其经过裁撤人数有限的军队投入到了南部的重建当中。从此,双方停止了在边界上的军事竞赛,安全困境开始消解。一条世界上最长的、神话般难以置信的、互不设防的边界就此形成。这一安全合作所致的军事互动极大地提高了双方的安全互信度,促进了朋友认同的形成。

(二) 文化同质性

温特认为,集体认同的先决条件是行为体根据将它们构成群体的特征相互

^①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p. 340.

^② *Ibid.*, p. 208.

视为同类,因此,同质性认知对建构集体认同是有利的。^①虽然学界对此一直存有争议,但是,任何有历史感的学者又不能不顾及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异质化常常导致矛盾与冲突。从古代十字军东征到现代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从冷战后的文明冲突论到拉登(Bin Laden)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的讨伐无不昭示着这一客观存在。“国内(政体、经济与文化的)差别可以成为外在冲突的一个来源。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减少国家之间的差别会增进它们利益的趋同,这就会减少自利认同的影响,推动集体认同的形成。”^②同质化的国家间更容易产生亲善的行动与态度,而这种互动反过来又会强化这种认同观念,塑造一种现实。

英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同质性,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英美两国享有共同的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文化。这种一致感尤其在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出台后得到了加强,这一法案扩大了有选举权的选民的人数,增加了下议院的权力,从而增加了两国政治认同的基础。美国人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积极倡导并鼓吹建立英美联盟:“对于自由和民主、民权和民智(popular intelligence),对于人类进步事业以及一个自由而现实的基督教而言,谁能衡量出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会给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带来的好处呢?”^③当时英美社会中存在的这一思想,反映了民众对两国政治文化的高度认知。其次,英美两国同根同源、同宗同脉。大西洋两岸的精英们无不将彼此视为同一种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年代里,许多英美人都认为他们共同持有的种族身份优越于世界其他民族,“白人负担”(The White's Burden)论的流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致认为,作为白人的杰出代表,他们是惟一有能力去表达世界其他地方人们需要的民族,他们在道德上被赋有神圣的使命去拯救世界,来使世界变得更好。另外,许多人认为种族冲突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与其他民族发生了冲突,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就该彼此相助。英美的这种共同的种族主义思想意味着倘若在两国间发生战争,那就无异于兄弟自相残杀,这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发生的事情。英美之间存在的文化同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54.

② Ibid., p. 354.

③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p. 55.

质性为两国培育相互间价值观念的共识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两国在众多事件中的互动又再现和重构出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我们”感(we-feeling)。

(三) 战略克制

战略克制是促使朋友认同形成的最关键的变量。建构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奉行理性自私的民族国家要步入朋友认同之途,面临着最根本的障碍是,对一旦转向集体认同是否会被强大的“自家人”吞掉而心存疑虑。要解决这个担心,就要建立一种高度互信,而战略克制对国家间培育互信至关重要,可以使双方不断增加的认知逐渐建立起一种好感形象,从而促进了朋友认同的产生。因为自我约束行为传递了一种善意和一个国家放弃单独获益机会的意愿。在认同观念自我实现和强化机制的作用下,长期以友好和善意的估量行事就会转化为一种良好形象,随着相互间好感和亲近感的不断加深而产生出互信。

战略克制在英美之间朋友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克制行为模式并不是对称的。在英美权力转换的过程中,英国向美国展示了更多的自我约束行为而不是相反。如上文所述,1812年以后,英美双方进入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期,两国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公开磋商与谈判,特别是在涉及领土争端等核心问题上表现出克制、大度和友好的态度并最终达成和解,有效地消解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一系列严重冲突。其中包括“卡罗琳号”事件、内战中的特伦特邮船事件和“亚拉巴马号”事件、委内瑞拉危机、巴拿马运河冲突,涉及的领土问题有缅因、俄勒冈、阿拉斯加等边界争端。随着英美双方自我战略克制和适应,双边的互信度和朋友认同逐渐得以形成和提高。

总之,在英美认同的转换过程中,安全合作、文化同质性、战略克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若所有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就最有可能推动认同的转换。就国家具体来说,如果国家长期坚持战略克制和调整、自我限制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加上重视安全合作和同质性的作用,那么朋友认同就会更易实现。

六、英美认同变迁的意义

英美之间经过了长期的良性外交互动与磨合,最终实现了从敌人认同、对

手认同到朋友认同的转换,这种认同变迁对于英美两国权力的和平转移具有特别的意义。

从敌人认同到对手认同再到朋友认同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英美两国安全认同从无到有不断增加的过程。最终双方在安全问题上淡化自我而筑就了共同安全利益,它为双方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在这种认同作用下,彼此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反而互相视作朋友。对双方而言,被朋友认同所赋予的军事力量已失去了昔日在竞争状态中的那种意义,双方之间发生战争是难以想像的。正像英国海军大臣塞伯纳勋爵对此所作的评述:“无论是英国还是大英帝国的各个成员,都无不将与美国发生的战争视为大英帝国外交关系中的最大邪恶。”^①国内事务大臣李(A. H. Lee)说:“我甚至连片刻都没有想到过英美之间会真的发生可能的敌对。”^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05年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认为英美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所有危险都已经结束了,而且永远结束了……同其他大国相比,英国对我们的友好感更加真诚。”^③

英美两国形成的朋友认同,在两国外交互动实践中产生了一种对和平变迁的可依赖预期。这种预期对美国和平崛起而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难得的外部安全环境。美国得以在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同英国进行互惠贸易和深入的经济合作,充分吸收和利用英国工业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发展自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此安全得到保证的条件下得以节省巨大的军费开支以集中财力优先发展经济,使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首先实现了起飞。1873—1913年之间,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而英国同期仅为1.6%。到1885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占世界制造业份额最大的国家。一年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从能源消耗方面来说,美国1890年超过了英国,1900年超过德国、法国、奥匈、俄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总和。^④而同期军事力量的发展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90年的现役部队只有25 000人,位居世界第14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海军力量在强国中位居最末,排在意大利之后,而作为欧洲

^① Kenneth Bourn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p. 381.

^② Ibid.

^③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p. 172.

^④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201.

最小部队的意大利拥有的数量仍是美国军队的 8 倍,美国的工业实力却是意大利的 13 倍。^① 美国军事力量的滞后发展的另一个好处是减轻了当时霸权国英国的疑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对英的和平形象,削弱了历史上大国崛起时往往伴有的外部性,增进了双方的安全认同。实践表明,美国军事延迟发展的时期与英美朋友认同的形成期基本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从权力和平转换的角度来说,英美两国间产生朋友认同及和平变迁可依赖预期的重要性,还在于使美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关键崛起阶段避免了与霸权国英国发生直接对抗,为美国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及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尽管美国 19 世纪末经济实力空前强大,但美国的综合国力与英国相比还相对弱小。英国虽然在此时已出现衰落征兆,但权力依然处于世界顶峰,强大的综合国力似乎无人能敌。而美国同期除了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外,国际影响力更是极其弱小。在当时,美国绝少参加国际会议,也未曾参与大国间共同的决策,仅仅被当作国际体系中的二流国家来对待。1880 年,一位德国使节宁愿忍受减薪的降级待遇也不愿改派到华盛顿。1892 年前,驻华盛顿的外交官无一不是大使级,因为没有欧洲国家认为美国足够重要,值得派遣那个级别的外交使节。^② 很难想像,如果英美之间没有发展出一种对和平变迁相互认知的朋友认同,相反互视为敌手,美国能够得以顺利崛起。而双方直接对抗的结果对正在崛起中美国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势必会延迟甚至中断美国崛起的进程。

对大英帝国而言,同美国缔结友好纽带,避免代价高昂的冲突,对于行将衰落的帝国权力的维护意义也十分突出。德国人曾预测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将会有一场把美国卷入的战争发生,正如俾斯麦(Bismarck)明确无误地对英国所说的那样,英国必须在大西洋与美国崛起的海军对抗,这意味着英国将同德国结盟,这样一个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的联盟具有战略政治意义。但是,相反英国却选择了与美国和解。^③ 英国首相阿瑟·鲍尔弗曾公开提出:如

1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p.202—203.

② Ernest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pp.3—6, inferred from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48.

③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178.

果美国负起责任,使干涉没有必要,不列颠将支持门罗主义,并避免进行干涉。^①这一时期英国国内的文件中充满了关于“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的必要性”,或者是“依赖同美国的友好来保护英国在西半球利益的痛苦选择”^②。保罗·肯尼迪曾经对英国与美国和解的作用给予积极评价,他指出:“大英帝国的长寿极大地得益于美洲的平息。”^③双方选择友好互动的最终结果是英国避免了美国挑战,延缓了衰落。美国则借助巨人的关爱迅速崛起,由此,双方突破了霸权兴衰理论中新兴大国挑战霸权国的战争定式,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

由此,从英美间国家互动和认同转换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全球性权力的和平转移,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仅是权力竞争,也是认同竞争;不仅是权力的转换,更是认同的转换。国家间如果只关注权力竞争本身,霸权战争的怪圈就无法打破。而从作为一种共同认知框架的认同着眼,则有可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英美两国经过长期不懈的认同磨合与认同转换,大大削弱了处于权力转移两端的英美两国对权力竞争的依赖,消除了彼此间的威胁意识,培育了一种安全互信的朋友认同,从而使权力和平转换的可能性最终变成现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拥有权力的国家的认同而不是权力均衡本身,就成为大国间实现和平转移权力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对于处于当年美国类似地位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更深远的蕴涵与启示。

① 阿瑟·林肯·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②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87—188.

③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London: Allen & Unwin Press, 1983), in: *From Wealth to Power*, p. 166.

作者简介

罗纳德·塔门(Ronald L. Tammen)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马克·汉菲尔德政府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1965年在太平洋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66年和197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Spending* (1975); *MIRV and the Arms Race* (1973)。

电子信箱:tammen@pdx.edu

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 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协会主席(2004—2005),*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编辑。1965年和196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73年在密歇根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Parity and War* (1996);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1987); *The War Ledger* (1980)。

电子信箱:Jacek.Kugler@cgu.edu

封永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03级博士生。1999年和2002年在河北大学获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afeng1989@163.com

徐进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级博士研究生。1994年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x-j04@mails.tsinghua.edu.cn

邹明皓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专业2002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pzyzmh@163.com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学教授。1985年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最新发表论文“China: A Crucial Bridge for the 2005 NPT Review Conference,” *Arms Control Today*, Jan./Feb. 2005;论著有《军备控制的理论与分析》(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子信箱:libin@mail.tsinghua.edu.cn

陈昌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1997年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学位;2003年在国防大学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chchsh@pku.edu.cn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电子信箱:pkusongwei@yahoo.com.cn